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Harvard-Fuda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Neighborhood Tokyo

邻里东京

[美] 西奥多·C·贝斯特 著 国云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Neighborhood Tokyo

邻里东京

[美] 西奥多·C·贝斯特 著 国云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邻里东京/(美)贝斯特(Bestor, T. C.)著;国云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书名原文:Neighborhood Tokyo

ISBN 978-7-5327-4380-3

I. 邻… II. ①贝…②国… III. 社会人类学-研究-东京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6532号

Theodore C. Bestor

NEIGHBORHOOD TOKYO

© 1989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本书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译出

图字:09-2006-335

邻里东京 [美]西奥多·C·贝斯特 著 国云丹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978-7-5327-4380-3/C·025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727956

总序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 and 地区,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间的“桥梁”。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间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相信,包括华琛(James L. Watson)、华如璧(Rubie Watson)、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及本人在内的哈佛人类学家,在比较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田

野实践和理论探索,将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化 and 专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貌。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熟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这套书,还展示了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以及行政机构的田野考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将展示人类学方法在精神医学领域,包括像政治性创伤、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等方面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齐心协力,能在中国创造出全新的人类学领域,同时,鼓舞中国的同仁们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探索 and 发现,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成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Arthur Kleinman(凯博文)

2007 年 10 月 24 日

致谢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可能比其他学科的研究更倚赖为数众多人的自愿协助、支持和鼓励。这本著作也不例外。我将最重的感激之情献给宫本町的很多居民,他们友好地允许妻子和我介入他们的生活达两年之久,还忍受我不断且经常是幼稚的提问。我们来到这里时,是完全的陌生人,离开时我希望我带走的是终生的友谊。友谊和感激之情理应以公开的致谢给予回报,然而我整个研究过程中许下的保密诺言却需要我采取匿名的方式。我甚至都不可能提到曾经友善地帮助过我的所有宫本町居民。我惟独希望自己没有亵渎他们的信任,这本书对这些人 and 他们的社区是公正适当的。

我衷心感谢使我 1979 年 5 月至 1981 年 5 月的田野研究成为可能的各方面的支持:日本学位论文奖学金;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学位奖学金(BNS 7910179);国家精神健康博士研究生训练机构奖学金(MH 08059);由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授予的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当我从日本返回写作学位论文期间,斯坦福国际研究中心提供了额外支持。

来自 Sigma Xi 科学学会的授权使我有可能在 1983 年 9 月短暂地返回东京一趟,收集有关地方政治方面的资料。Wenner-Gren 基金会对人类学研究的资助和来自日本基金会的短期奖学金允许我于 1984 年夏天在宫本町从事为期两个月的关于土地所有模式

的研究。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会及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来自亚洲研究协会东北亚委员会的奖金,支持我于1986年六、七月再一次到东京对土地所有模式及其与小商店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考察。在这些最近的旅行中,我也进一步收集了邻里变迁的资料,并使老朋友们确信在所有这些调查之后我确实要出版一本书。虽然在目前这本书中我只使用了最近几次调查收集到的资料的一部分,但我有机会返回宫本町核对我之前收集的资料并追踪最新的发展变化,这个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在手稿最终完成时,来自三得利基金会的资助为我绘图和做索引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我感谢玛里琳·奥尔德姆在绘图时尽职的工作,以及她核对参考书目和手稿细节的认真。尼克·富斯科对绘图所提的建议非常有价值。安妮·马尔道尼和凯瑟琳·卡斯·萨顿在我最后完稿阶段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金·布兰特和克莱尔·赛斯罗特别认真地校对了全稿。

在我最初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我是东京都立大学(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社会学系的一名研究生。我诚挚地感谢小谷野升吾教授的仁慈和指导,他在退休之前为我做好了联系安排;感谢仓泽亨教授,他在1980—1981年间是我的保证人和指导老师;感谢萱村望教授,为我的田野工作和此后几年提供的有创见的建议。我尤其要感谢现在正在系里完成博士学位的文室年子,她非凡的能力和热情的帮助还有她的友谊,使我整个研究顺利进行。也尤其感谢当时日本语言学会校际中心(the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Japanese Languages Studies)的纳广吉,他是我从事田野工作时的辅导老师、知己和密友。感谢平畑寺安允许我使用市政府的图书馆。品川区办公室和东京市政府的无数官员不厌其烦地回答

我的问题,为我提供报告文件,并将我引向相关的资料来源。

在我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斯坦福大学指导老师们的慎重建议和尖锐批评:别府春三,彼得·达斯,伯纳德·西格尔和西尔维娅·亚那吉斯科。我感谢他们所有人,但尤其要感谢别府春三做我长期而有耐心的主要指导老师。

现在这本书的大部分是1983年3月到1985年12月我在社会科学委员会(SSRC)任职时写的。时任主任的肯尼斯·普鲁伊特慷慨地许我时间写作这本书,并准许我几次返回宫本町,在我离岗期间,我的同事积极地承担我这部分额外的任务。我要特别感谢索菲亚·萨。

加里·艾林森,卡罗尔·格鲁克,查默斯·约翰森,R·J·史密森和怀特等人一针见血地评论了我草稿的全部或部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极大地帮助了我,使我研究的焦点更加突出。家人耐心地反复阅读了书稿,当文中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时,即温和地指出来。尤其是D·K·贝斯特关于编排的建议,极大地改善了该书的风格和结构。阿瑟·贝斯特的支持——在道德和计算机编排两方面——是无价的。芭芭拉在编辑工作方面一丝不苟,又不失耐心和幽默,对本书的最后出版起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上爱人的耐心。人类学的研究是一项集体的事业,爱人在田野工作中作出的贡献是难以计算的。如果没有我的妻子,维多利亚·列昂-贝斯特,这本书的形成是不可能的。我待在宫本町期间,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热心的研究者,为我提供了可能会忽略的数据、观点和人际联系。在写作和修改书稿过程中,她是我耐心的意见征询者、优秀的编辑和温和的批评者。无论什么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谢意。

无论如何,对于本书所陈述的研究结果、解释和结论我个人负有完全的责任。

西奥多·C·贝斯特

说明

本书中所有的日语单词都依照日本研究社的《新日—英词典》(第4版,1974年)采用的平文式日语罗马字拼法系统转译成罗马字拼法。日语人名以西方的习惯排列,个人名在前,家族姓在后。我虚构了宫本町和过去以及现在该邻里所有的组织、机构和居民的名称,以确保私密性和邻里居民的匿名性。居民的身份更是通过改变年龄、职业或家庭背景等细节给予进一步修饰。所有的日文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按当地习惯将宫本町的居民称为“高桥先生”或“蜷江太太”。之所以这样做,我是想传达该邻里居民彼此之间的某种礼节,除了亲戚和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他们几乎不直接称呼一个人的。除了亲戚之外,几乎所有居民在谈到或称呼某人的时候,后缀 san(先生或小姐/女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居民的名字后使用 san,可能会使习惯于性别语言差异的读者感到混淆。居民在称呼中还使用了其他的后缀,如 chan(san 的爱称),kun(老师和邻居在称呼男孩,以及公司经理称呼他们亲密的男性下属时使用的具有男子气的叫法),以及 sama(san 的尊称,常用于指称神灵),但是英语中却没有得体合适的词与之对应,因此就不加翻译地出现在本书中。

我还保留了 san 的尊称 sensei(“先生”或“老师”),这个称呼也是放在家族姓之后表示敬意。与 san 一样,sensei 也只在人们称

呼其他人的名字时使用(从来不用来称呼自己或自己的某位亲戚)。Sensei 一般用于称呼学校老师、传统舞蹈和茶道的指导者、大学教授、电视评论员以及政治人物。

文中我几处提到东京交通的主干——日本国铁(Japanese National Railway)。1987 年该铁路已私有化,现在以日本铁路(Japan Railway)的英文首写字母“JR”为人们所熟知。

在提到钱的时候,我没有将日元的金额换算成美元,因为过去几十年之间汇率的变化将会使得以美元表现的相对价值变得不真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汇率大致稳定在 2 日元对 1 美元。而在美军占领期,汇率被随意地设定在 360 日元对 1 美元,该汇率持续到 70 年代初。在我从事田野研究期间,汇率在 190 到 230 之间浮动,而在我完成书稿的 1988 年初,则在 125 左右徘徊。

全书中我涉及到了以下几个日本历史时期:德川时期(Tokugawa period,1603—1868);明治时期(Meiji period,1868—1912);大正时期(Taishō period,1912—1926);以及昭和时期(Shōwa period,1926—1989)。

序言

日本城市的老城区往往由一个个界限分明的邻里 (neighborhoods) 组成。这些邻里的划分不只是类似于邮区或者警署辖区一类的行政设置,而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分类息息相关。这些邻里也不是城市中一些大的社会区划的命名标志,就像提到华尔街、威廉斯堡和西村就让人想到纽约,或者说起油水区、诺布山和北海就让人想起旧金山一样。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这些邻里在地理上分布紧凑,在空间上相对独立。然而,一个偶然经过这里的观光客,如果不留意的话,经常难以注意到这些邻里之间的独立性。每个邻里包括的居民数从几百个到几千个不等,他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具有很强的凝聚力。^①

在东京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邻里都是很小的社会单位,以大多数美国人的标准,这些社会单位在地理范围和人口规模上都太小了而不能称之为“邻里”。然而,对于东京尤其是城市中既定区域的居民来说,这些邻里是城市景观中具有社会意义的分类单位,并且在地理上也是可识别的。在这些邻里中,相互重叠、内在交织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为当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完备持久的结构,居民之间不仅可以通过本地的组织,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相互发生联系。

本书是关于日本宫本町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的民族志研究。宫本町是我为东京地区的一个居住商业区所起的化名,1979

年6月到1981年5月以及此后的几个夏天,我在那里从事田野调查。这是关于一个邻里社区的社会建构和维系的研究,在日本,这些社区被认为是过时的,甚至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这些趋势在最近的百年中使日本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不是一项关于传统的研究,而是关于传统主义的研究,前者是历史连续性的一部分,后者是指通过赋予当代的社会现实有价值的历史内涵,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和文化主题进行操纵、创造和重新组合,从而使当代社会获得合法性的地位。这项研究是关于邻里社区内外的人们之间常常发生的微妙而无声的争斗,这些争斗体现在关于文化传统的那些看似无实质内容的习语中,主要是关于社区资源,社区认同和自治感这些最稍瞬即逝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外关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但自R·P·多尔(R. P. Dore)的《日本城市生活:关于一个东京行政区的研究》(*City Life in Japan: A Study of a Tokyo Ward*) (1958)一书出版以来,对于东京及日本其他大城市的城市社区和城市生活的微观结构关注很少。《日本城市生活》是英语世界对日本城市生活惟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该书是在1951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当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还没结束,谁也不曾预料到日本日后会出现“经济奇迹”。作为对日本城市生活和社会制度第一项重要的研究,多尔的书涵盖了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他初次涉及的许多主题从此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引发了相当

① 在日本特有的地域概念里,这样的邻里单位通常叫做“町”,一般跟在地名的后面,如“樱木町”、“大井町”等,意思是居民密集的、生活设施齐备的地域、都会等等。——译者

多的研究。有关日本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专著——白领家庭生活的动力学,工作场所的社会组织,教育背景与社会流动,城市政治,大众社会的宗教生活和制度,城市地区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日本组织决策的动力研究,以及其他几十个主题——非常详细地探讨了在多尔的开创性著作中首次涉及的社会模式和制度。在多尔的研究中,只有城市社区机构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这个主题,西方学者还未曾有最新的综合性研究。

许多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宫本町发现的社区模式和多尔三十年前对下山町的描述具有相似性。当我访问宫本町的居民时,头脑里总是出现一个古怪的想法:他们在跟我交谈之前刚刚读过多尔的书。我怀疑多尔也不曾料到,他发现的邻里社会生活模式在三十年后的东京仍然普遍存在。以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处的背景来看,很显然,那些与邻里社会密不可分的旧秩序即将淡出历史,人们不可能期望这些模式历经三十多年而不发生彻底的改变。邻里社会表面上的稳定性是本书分析的主题之一,但是要提醒读者的是,我无意或试图重复多尔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我也不想做关于城市生活过去和现在的后续比较研究,我很少在自己和他的研究成果之间进行清楚明确的比较。

相反,我描绘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宫本町的社会生活,并分析内在和外在于邻里的力量,这些力量创造和维系了一种结构,当地的社区生活在其间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多尔将下山町作为一面镜子,透过它来反映一般的日本城市生活。在许多方面,他关于城市生活不同领域的分析并非局限于下山町之中。我的研究则更近距离地聚焦于一个独特的邻里及其内部的运作方式,但是我也会考虑一个宽泛的问题,即一个邻里如何与城市更大

的宏观环境进行互动,并被后者所型塑。我将宫本町内部发生的社会生活与当时日本社会所处的特殊环境联系起来,概括世纪大转折以来影响和塑造着东京,使宫本町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力量。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如东京 20 世纪早期的发展与邻里制度的创造之间的关系,或邻里组织领袖作为整个东京阶层化力量的一分子所具有的社会地位,我认为宫本町并非一个与世隔绝或只是依赖内部力量维系的社区,而是一个只有被置于整个东京的背景中才能被理解的邻里。通过考察这个大的背景,我提出城市社会表面上的稳定来自于邻里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而并非来自孤立的社区或阶层的内部作用。甚至,我认为内部看上去明显的持续性是传统主义的后果——即当代对于“过去”概念的解释、创造或操纵而赋予当代社会关系一种神圣的光环。这个文化过程不仅造就了宫本町内部的社会关系,还在一系列社会领域中对当代社会组织模式的结构化起了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作用。

既然这是关于单个社区的民族志研究,我不能宣称我的研究成果适用于日本所有的城市邻里。但我仍然相信宫本町至少是东京较大地域范围中的一个典型社区。虽然在宫本町编织着邻里生活的具体要素的组合形式可能是独特的,但人们可以在东京的其他地方发现这些要素本身,同时,组合和联系着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以形成这个或那个邻里的文化过程都具有普遍的特征。

在挑选研究地点时,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邻里,它不具有与东京其他邻里迥异的明显特征。相比于怀特(White 1982:267—271)为做人口迁移和东京生活的适应比较研究而选择三个邻里的标准,我更多是凭印象来选择。我寻找的邻里要与主干道和大

的火车站稍微有点距离,也要避免靠近其他能带来大量人流的场所,因为这些场所将使之成为通往各地的通道而不是当地社会交往的场所。我需要一个本质上是居住的而不是具有多元社会意义的邻里,这样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场所和设施。我要找的邻里,它的商业区主要是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而不是因为品种特别丰富或品质出众而吸引别处的顾客远道过来购物。我希望找的邻里散布着一些小商店和小工厂,但它们并不只是与某单一产业相联系。我对那些有着明显专业化分工的邻里不感兴趣,如专营电子设备的秋叶原,专营二手书的神田的神保町,专营木材的木羽,佛教圣地稻荷町或专卖儿童玩具的浅草桥。我被那些内部有神社的邻里所吸引,但应该是一些小的社区神社,而不是足以成为旅游胜地的大神社或名神社。我希望找的邻里,是不同住宅样式的混合体,而不是某一个公司在市郊建造的庞大职工公寓楼或住宅群。最后,我要找的邻里,应该不至于太古老而曾经是江户老城(Edo,1868年之前的东京)的一部分,也不应该太新,其住宅区(以及社区生活的兴起)大部分在二战之后才出现。

在我搜寻符合以上这些普遍要求的邻里时,我之前几年在东京的居住经验发挥了作用。我曾经居住过东京包括上流社会的市郊和工人阶级的工业化邻里在内的六个邻里,从我的这些直接居住经验中,还有这些年来我在东京地区其他几十个邻里的参观体验中,以及我在京都和名古屋的逗留和在日本其他城市的旅游经历中,我获得了一个关于我想要考察的这种邻里类型的清晰的概念。

我不要任何超出寻常的东西。东京有七十个国有铁路站,以其中大多数的站为起点开始步行,没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一个符合

这些要求的邻里。但很多时候寻找平常的东西比寻找特殊的难度要大。我心里非常迫切,妻子和我在几星期之内走访了散落在东京的几十个邻里。我们甚至去寻找多尔写到的下山町,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走过杉浦家的商店,这是约翰·内森(John Nathan)关于东京“商业区”的纪录片——《满月午餐》(*Full Moon Lunch*)中的主题。

搜寻工作令人沮丧。我对于一个普通地方的标准如此精确(或可能是太宽泛),以至于当我们试着在大约几千个典型的东京邻里中选择一个时,总是令人非常迷惑。然而,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因为我想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妻子和我计划就住在研究点或者非常靠近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不行,我们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考虑到在东京谈一个房屋租约所需花费的天文数目的金钱,重新搬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第一次就找准目标。

幸运的是,暗中佑护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幸运女神经常会给我们的搜寻工作带来好结果。一个学生助手,克里斯蒂娜·特纳,英明地建议我“选择一个人际网络,而不是一个邻里”:想想我现有的人际关系在哪个地方最强且看起来最可靠,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认为我去哪里比较合适。大约一天之后,一对朋友夫妇(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在东京遍布搜寻的过程中,他们耐心地为我們提供食宿方便)建议我们在他们家附近找一个邻里,丈夫就在那里长大,且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政治家,现在已退休。我们参观了这个邻里,发现它正是我一直要找的。我现在叫做宫本町的这个地方,正是一个混合居住区和商业区,里面有一个不大但是保留完整的神道教(Shintō)神社,在神社一个街区之外是一个车水马龙